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 扩就业效应研究^{*}

王 轶 赵元星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返乡创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返乡创业成为民族地区扩就业的重要途径。本文使用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结果发现,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平均招聘员工人数低于非民族地区,样本调查年份平均每个企业的差距约4人,这一差距在生存型创业企业中较小,在发展型创业企业中较大;在第一、三产业中较小,在第二产业中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创业者创新能力越强、企业销售收入和企业银行贷款越多越会显著扩大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用工规模,企业合作不能明显扩大企业自身的用工规模。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创新补贴、政府采购等措施提升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能力,加大对返乡创业企业金融支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基础设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 返乡创业 扩就业

作者王轶,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编审;赵元星,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4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①然而,我国民族地区就业率低,^②民营企业数量缺乏,^③绝大多数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没有劳动合同,^④制约着民族地区扩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返乡创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民族地区返乡创业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扩就业的重要力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劳动力创业质量研究”(项目编号:18AJL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② 参见张立新、淡卫军、李嘉娜、王压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就业促进实践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9期。

③ 参见张倩、杨勇:《少数民族地区民营企业“走出去”困境与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④ 参见邓光奇、韩金镛、蔡宏波:《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特征的变化——基于六次“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的分析》,《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裕”，其中，生活富裕是根本。生活富裕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返乡劳动力的创业活动正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途径。^①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返乡创业扩就业的政策。如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返乡创业以促进农民就业；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返乡创业政策保障以带动更多就业。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各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积极性。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测算，2020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②

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对于有效推进民族地区扩就业政策、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当地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较分析不同类型、不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影响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招聘员工规模的因素，从而为制定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一、文献综述

从理论上来说，扩就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就业机会。如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来扩大劳动力参与就业的机会。二是扩大就业总量。如企业增加招聘员工人数，扩大劳动力参与就业的总量。本文扩就业是指后者，即返乡创业企业招聘当地劳动力，扩大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总量。目前检索到返乡创业与扩就业的文献相对较少，创业与扩就业的文献相对较多，而返乡创业是创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本文仅梳理创业与扩就业的相关文献。

一些研究认为创业对扩大就业总量具有正向作用。谢弗(Shaffer)研究了美国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美国创业可以促进本部门的就业增长，同时发现创业具有促进就业的外部效应，即创业可以带来其他部门的就业增长。^③尼古拉(Nikolaj)等人分析了丹麦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丹麦新建立企业对就业增长具有明显的贡献，新建立企业带来的就业岗位增长约占总的就业岗位增长的三分之一。^④董虹认为，创业对于就业具有乘数效应。^⑤蔡卫红考察了福建省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创业活动能增加企业数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⑥卢亮和邓汉慧分析了全国1995—2010年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对就业具有积极的正向作

① 参见王轶、熊文：《返乡创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② 参见《乡村产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预计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010万》，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20年12月29日，http://www.moa.gov.cn/ztl/nynfczj/202012/t20201229_6359100.htm。

③ 参见Sherrill Shaffer, "Establishment Size and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26, No. 5, 2006。

④ 参见Nikolaj Malchow-Miller, Bertel Schjerning, Anders Srensen, "Entrepreneurship, Job Creation and Wage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6, No. 1, 2011。

⑤ 参见董虹：《放低创业门槛 实现就业乘数效应》，《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

⑥ 参见蔡卫红：《创业促进就业的机理和路径选择——以福建省为例》，《福建论坛》2012年第1期。

用,创业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业总量会相应地提高0.11—0.22个百分点。^①李长安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业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揭示了创业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②侯永雄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实证分析表明,创业率的增加,会提高微观个体就业的可能性,创业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微观个体就业可能性就会提高0.2个百分点。^③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创业对扩大就业总量的作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弗里奇(Fritsch)分析了(前)西德1986—1989年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制造业中,企业进入率和就业变化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统计关系,但是在服务业却是负向的统计关系。^④卡里(Carree)和图里克(Thurik)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创业与扩就业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创业的增加与就业量的增加相关,但创业带动就业的短期效应较小,中期存在负面效应,长期为正面的积极效应。^⑤李政认为,创业与扩大就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另一方面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会受到区域因素影响。^⑥王轶等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规范性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财务管理规范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能够显著带动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带动的效应与创业企业的创业类型存在密切联系。^⑦杨青山认为,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不是即时的。^⑧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创业对扩大就业总量的作用会受到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佐尔坦(Zoltan)和帕梅拉(Pamela)研究发现,地区的商业活力程度越高,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就越强。^⑨王玺认为,政府对创业者开展创业培训,有助于创业者进入社会服务业,并且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⑩李长安和谢远涛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有积极的正面作用,而实际租房价格、实际职工工资和实际贷款利率等要素价格变动与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均呈反向关系。^⑪他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水平都对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且第三产业比重的效应要强于人均GDP的效应,而人口素质与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呈负向统计关系。^⑫谢恒和杨琴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创业带动就业的机制与路径,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促进创业资源要素聚集、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给予政策扶持等措施对实现创业带动就业都有正面的积极作用。^⑬杨金梅认为,创业带动就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运

① 参见卢亮、邓汉慧:《创业促进就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管理》2014年第3期。

② 参见李长安:《我国四次创业浪潮的演进:从“难民效应”到“企业家效应”》,《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③ 参见侯永雄:《创业促进就业的微观证据及影响因素——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11期。

④ 参见Michael Fritsch,“Turbulence and Growth in West Germany: A Comparison of Evidence by Regions and Industrie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11, No. 2, 1996。

⑤ 参见M. A. Carree, A. R. Thurik,“The Lag Structure of the Impact of Business Ownership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OECD Countrie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0, No. 1, 2008。

⑥ 参见李政:《促进创业理论:企业发展带动就业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⑦ 王轶、孙晓悦、文宗瑜:《企业管理规范性何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

⑧ 参见杨青山:《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时滞效应研究——基于数学建模方法》,《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

⑨ 参见Zoltan J. Acs, Pamela Mueller,“Employment Effects of Business Dynamics: Mice, Gazelles and Elephant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0, No. 1, 2008。

⑩ 参见王玺:《创业培训机制对扩大就业的作用探讨》,《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15期。

⑪ 参见李长安、谢远涛:《经济增长、要素价格对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的影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⑫ 参见李长安、谢远涛:《影响创业带动就业的宏观因素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⑬ 参见谢恒、杨琴:《论欠发达地区创业带动就业的机制与路径》,《求索》2013年第6期。

行,需要基层政府转变服务职能,提出通过强化服务理念、优化服务职能、创新服务手段等措施,来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战略目标的实现。^①何晓斌和柳建坤研究发现,外出创业经历会通过拓展创业者的市场性关系网络促使创业者使用电子商务,从而影响创业带动就业。^②

从上述文献来看,学者们对创业与扩就业展开了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但国外劳动力市场基于自由竞争,国内劳动力市场尚处于转型中,因此不能照搬;国内学者对创业的扩就业效应还未达成一致结论,对民族地区创业与扩就业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将在如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做出贡献:一是分析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可以增强对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理解,也是对现有创业与扩就业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二是在分类型分产业比较视角下,分析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当地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差距;三是进一步分析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这些因素对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当地就业能力的影响程度。

二、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比较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于2019年对中国大陆地区返乡创业企业进行的联合调查。该调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中抽样,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到国家公布的典型返乡创业地区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均是返乡创业企业。民族地区数据的调查人员包括民族类高校的教师及在读学生,调查人员到民族地区对当地返乡创业企业进行调查,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

通过核实返乡创业者的身份,返乡创业企业营业执照和企业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有效性,企业数据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官网相匹配,调查过程全程录音等方式,确定调查对象的有效性和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整个调查过程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库调查团队的全程指导。

本次调查共发放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2425份,回收并通过质量审核的有效调查问卷2137份,有效调查问卷占总调查问卷的88.12%。考虑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返乡创业规模较小,因此将新疆数据和西藏数据从总样本中剔除。然后,在得到的最终样本中,本文将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云南省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区划入民族地区,其余地区划入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有513家,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有1622家。

(一)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分类型分析

本文以地区为划分,对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进行了统计。考虑到返乡创业者创业目的不同,其扩就业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根据返乡创业者创业目的的不同,将创业企业分为两类: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生存型创业是指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生存需要或者为了养家糊口等;发展型创业是指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目的是

^① 参见杨金梅:《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人民论坛》2017年第2期。

^② 参见何晓斌、柳建坤:《返乡创业者的外出经历与电商创业——基于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为了抓住当地商业发展机会或者为了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等。然后,对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进行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生存型创业较少,为 155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30.21%;发展型创业较多,为 358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69.79%。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生存型创业 369 家,占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22.75%;发展型创业 1253 家,占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77.25%。可知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生存型创业占比较高,而发展型创业占比较低。

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规模为 9.842 人,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规模为 14.137 人,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着 4 人左右的差距。分类型看,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生存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较弱,平均每个生存型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为 1.748 人;发展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较强,平均每个发展型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为 13.346 人。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生存型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规模为 2.089 人,发展型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规模为 17.686 人。意味着在不同类型的返乡创业企业中,民族地区的扩就业效应均低于非民族地区。分类型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分类型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统计

类型	全国		民族地区		非民族地区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生存型创业	1.989 (1.000)	524	1.748 (1.000)	155	2.089 (1.000)	369
发展型创业	16.721 (6.000)	1611	13.346 (5.000)	358	17.686 (6.000)	1253
全样本	13.105 (4.000)	2135	9.842 (3.000)	513	14.137 (4.000)	1622

(二)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分产业分析

返乡创业者的创业产业不同,其扩就业效应可能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作为分类标准,将返乡创业企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参照陈艳莹等人的研究,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①然后进行比较(统计结果见表 2)。

统计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第一产业为 50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9.75%;第二产业为 91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17.74%;中低端第三产业为 291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56.72%;高端第三产业为 81 家,占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15.79%。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第一产业为 148 家,占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9.12%;第二产业 359 家,占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22.13%;中低

^① 参见陈艳莹、原毅军、袁鹏:《中国高端服务业的内涵、特征与界定》,《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中低端第三产业是指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高端第三产业是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技术服务业。

端第三产业 902 家, 高端第三产业 213 家, 分别占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总数的 55.61% 和 13.13%。可知与非民族地区相比, 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第一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及高端第三产业的占比较高, 第二产业的占比较低。

分产业看, 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扩就业效应较强, 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分别为 17.040 人和 19.451 人; 第三产业的扩就业效应较弱, 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分别为 5.241 人和 11.136 人。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分别为 20.446 人和 30.421 人, 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平均每个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规模分别为 6.921 人和 12.869 人。返乡创业地多在乡村, 自然资源丰富, 有利于第一、二产业发展, 发挥较大的扩就业效应, 而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 主要是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来确定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第三产业的总体扩就业效应要小于第一、二产业。比较不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发现民族地区各类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均低于非民族地区(统计数据见表 2)。

表 2 分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统计

地区	全国		民族地区		非民族地区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第一产业	19.586 (8.000)	198	17.040 (6.000)	50	20.446 (10.000)	148
第二产业	28.202 (14.500)	450	19.451 (10.000)	91	30.421 (15.000)	359
中低端第三产业	6.511 (2.000)	1193	5.241 (2.000)	291	6.921 (2.000)	902
高端第三产业	12.391 (5.000)	294	11.136 (5.000)	81	12.869 (5.000)	213
全样本	13.105 (4.000)	2135	9.842 (3.000)	513	14.137 (4.000)	1622

为了进一步考察民族地区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本文按照返乡创业企业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细分, 统计结果见表 3。由统计结果可知:

第一, 民族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返乡创业企业, 其扩就业的效应低于非民族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 民族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返乡创业企业, 其规模化经营的程度低于非民族地区, 从而降低了民族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第二, 民族地区从事采矿业和建筑业的返乡创业企业, 其平均扩就业效应高于非民族地区; 从事制造业的返乡创业企业, 其平均扩就业效应低于非民族地区。一般而言, 采矿业、建筑业对于当地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营商环境等要素的要求比制造业低; 从比较优势或发挥比较优势的视角来看, 民族地区发展制造业的优势和条件要低于非民族地区。如果从上述的理论逻辑上看, 本文的实证结果是成立的。

第三,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 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效应大于非民族地区。我国近年来积极推进民族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信息通信水平, 从而可能增强了民族地区返乡创业者在这一行业的扩就业效应。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等行业,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扩就业效应与非民族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种结果估计与区域的人口集聚与经济水平有一定关系,区域的人口密集度高、经济相对发达,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也相对比较发达,从事上述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也就更为明显。

表 3 分行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统计

行业	全国		民族地区		非民族地区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招聘人数平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家)
农、林、牧、渔业	19.586 (8.000)	198	17.040 (6.000)	50	20.446 (10.000)	148
采矿业	12.800 (6.000)	15	13.400 (10.000)	10	11.600 (2.000)	5
制造业	33.434 (20.000)	311	19.900 (6.000)	40	35.432 (20.000)	271
建筑业	13.880 (7.500)	108	14.595 (10.000)	37	13.507 (7.000)	71
批发和零售业	5.978 (2.000)	637	4.664 (2.000)	137	6.338 (2.000)	500
住宿和餐饮业	6.854 (3.000)	328	6.484 (2.000)	91	6.996 (3.000)	237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5.025 (6.000)	80	16.400 (6.000)	25	14.400 (4.000)	55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9.027 (5.000)	73	6.125 (4.500)	16	9.842 (5.000)	57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5.955 (2.000)	199	4.450 (2.000)	60	6.604 (2.000)	139
教育	11.122 (7.000)	41	9.750 (6.500)	12	11.690 (8.000)	29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14.340 (4.000)	50	12.500 (3.000)	12	14.921 (4.000)	38

注:限于篇幅,本表只报告了部分典型代表性行业。

三、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偏弱,与非民族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分类型、分产业比较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因素,借鉴邵文波和盛丹的研究,^①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_i = c + \alpha X_i + \beta K_i + \epsilon_i \quad (1)$$

^① 参见邵文波、盛丹:《信息化与中国企业就业吸纳下降之谜》,《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其中, i 表示返乡创业企业个体; Y_i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返乡创业企业招聘员工人数; X_i 表示解释变量,即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银行贷款、企业合作; K_i 表示控制变量,即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创业培训、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 c 表示常数项, α 、 β 表示待估计的参数, ϵ_i 表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返乡创业企业的招聘员工人数,是指返乡创业企业招聘当地劳动力的人数,调查问卷中的问项为:“您招聘了几名工作人员(领工资的,包括给家人发工资)?”返乡创业企业招聘当地劳动力,扩大了当地的就业总量。调查数据显示,返乡创业企业招聘当地劳动力中有部分劳动力为残疾人或贫困户,说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受益群体非常广泛。本文主要考察返乡创业企业扩大当地的总就业人数,因此选择招聘员工人数作为衡量扩就业效应的关键指标。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银行贷款、企业合作。创业者创新能力是指返乡创业者用创新方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能力,1=很不强,2=不强,3=一般,4=比较强,5=非常强。企业销售收入是指返乡创业企业的年销售收入,1=0—20万元,2=21—40万元,3=41—60万元,4=61—100万元,5=101—300万元,6=301—500万元,7=501—1000万元,8=1000万元以上。企业银行贷款是指返乡创业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企业合作是指返乡创业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情况,包括购买原材料、客户推荐或到其他商家借销售的商品等,1=无企业合作;2=有,1—3家企业合作;3=与4家以上企业合作。

理论上,影响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因素可以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①其中,内部因素集中表现为返乡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返乡创业企业的年销售收入。返乡创业者的创新能力越强,其创业企业的经营发展就越好,就能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创业者创新能力是影响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李宏彬等人的研究,^②选择创业者创新能力作为解释变量。企业销售收入是企业延续的保证,也是企业保持现有招聘规模和扩大招聘规模的前提。如果返乡创业企业销售收入下滑,就可能会导致企业面临流动性约束效应,^③甚至亏损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削减招聘规模,造成更多劳动力失业。相反,如果返乡创业企业销售收入上升,企业就能健康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增加招聘规模。因此,本文选择企业销售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影响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企业外部因素中,从银行获得贷款和返乡创业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情况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贷款是返乡创业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可以促进返乡创业企业扩大投资,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扩大企业招聘劳动力的规模。金融部门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促进就业,金融发展对就业增长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④因此本文选择企业银行贷款作为解释变量。返乡创业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共赢,实现优势互补,资

^① 参见郭思文、陈建伟:《民族地区小微企业就业带动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② 参见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③ 参见刘贯春、叶永卫、张军:《社会保险缴费、企业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

^④ 参见高子涵:《论金融发展与就业增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源共享,从而扩大其招聘劳动力的规模。开发式合作和探索式合作显著积极影响企业绩效,^①因此本文选择企业合作作为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马光荣和杨恩艳的研究,^②将反映返乡创业者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加入了一系列反映返乡创业者个体特征的变量,包括创业者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创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反映返乡创业者家庭特征的变量,如家庭人口数。

创业者性别是指返乡创业者的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创业者年龄是指返乡创业者的年龄;返乡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如下不同水平:1=未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技校,6=大专,7=本科,8=研究生及以上;户口性质是指返乡创业者的户口性质,非农户口赋值为1,农业户口赋值为0;创业培训是指返乡创业者是否参加过创业培训,参加过赋值为1,未参加过赋值为0;婚姻状态是指返乡创业者的婚姻状态,有配偶赋值为1,无配偶赋值为0;家庭人口数是指返乡创业者同住的家庭成员人数。

表4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企业招聘员工人数	2135	13.105	25.724	0	4	153
创业者创新能力	2135	3.431	0.740	1	3	5
企业销售收入	2135	3.123	2.227	1	2	8
企业银行贷款	2135	12.924	60.164	0	0	480
企业合作	2135	2.079	0.765	1	2	3
创业者性别	2135	0.711	0.453	0	1	1
创业者年龄	2135	41.000	8.683	19	42	72
婚姻状态	2135	0.912	0.283	0	1	1
受教育程度	2135	4.377	1.519	1	4	8
户口性质	2135	0.338	0.473	0	0	1
创业培训	2135	0.416	0.493	0	0	1
家庭人口数	2135	3.882	1.398	1	4	12

注:为处理离群值,对企业招聘员工人数和企业银行贷款在1%和99%分位处缩尾。

变量统计结果的报告见表4。由结果可知,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招聘规模为13.105人,说明返乡创业确实存在着较强的扩就业效应。返乡创业者平均的创新能力为3.431,说明返乡创业者普遍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年销售收入的均值为3.123,变量赋值对应的销售收入在41—60万元之间,说明返乡创业企业多为小微企业。返乡创业企业平均获得的银行贷款为12.924万元,这一数值既说明了银行部门的支持对返乡创业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返乡创业对银行贷款存在着较大的需求;虽然贷款额度不大,但对于返乡创业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返乡创业企业平均的合作企业数量为1—3家,说明返乡创业企业存在较为广泛的合作。从个体特征来看,返乡创业者中,男性的比例为71.1%,平均年龄为41周岁,拥有配偶的比例为91.2%,平均受教育程度略高于高中学历,拥有非农户口的比例为33.8%,^③参加过

① 参见杨伟明、孟卫东:《联盟组合管理、合作模式与企业绩效》,《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7期。

② 参见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本文将返乡创业者定义为外出半年以上后,返回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创业的劳动力。因此部分返乡创业者不是农业户口。

创业培训的比例为41.6%。从家庭特征来看,返乡创业者中,平均家庭同住人口为3.882人。

(三)变量关系检验

使用stata15.1软件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一起计算相关系数,结果显示11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002—0.332之间,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满足标准要求(小于0.75),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5—1.37之间,均值为1.16,也满足标准值要求(小于10),说明各变量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四)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回归分析

将变量带入构建的模型(1)中进行回归,检验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银行贷款、企业合作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影响,并对全国总样本、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样本进行比较,回归结果见表5。表5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的招聘人数。表5中(1)、(3)、(5)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民族地区创业者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是3.42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创业者创新能力越强,越能招聘更多的员工。民族地区创业者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大于非民族地区,说明民族地区创业者创新能力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边际效应较强。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民族地区企业创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因此民族地区返乡创业者进行创新获得的创新收益更为明显,进而扩就业效应更大,而非民族地区创新更为普遍,因此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者进行创新获得的创新收益也相对不突出,进而扩就业效应也相对较小;二是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较高的第二产业,如制造业比重较小,因此创新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的效果相对明显,而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技术含量高的第二产业,如制造业比重较大,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包括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非民族地区返乡创业者创新的扩就业效应相对较小。

民族地区企业销售收入的回归系数是3.12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企业销售收入越高,越倾向于招聘更多的员工。但是,民族地区企业销售收入的回归系数小于非民族地区,说明民族地区企业销售收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边际效应相对偏弱。可能的原因是,与非民族地区的返乡创业企业相比,民族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口分散、信息化程度较低,因此返乡创业企业销售产品的成本相对更高,即使创业企业销售收入增加,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也略低于非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企业银行贷款的回归系数是0.13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中,企业银行贷款越多,越会扩大企业招聘规模。民族地区企业银行贷款的回归系数大于非民族地区,说明民族地区企业银行贷款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强。本文推测,银行贷款在扩大返乡创业企业的就业规模方面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增加一个单位的银行贷款,对获得银行贷款较少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扩就业效应,而对获得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只有较弱的扩就业效应。这与王恺的研究发现类似,金融能够促进就业,但该效应递减。^②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非民族地区,因此银行贷款在民族地区可能具有更大的

^① 参见郑长德:《民族地区技术缺口与创新发展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王恺:《金融规模、所有制结构与城镇就业容量——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扩大就业边际效应,即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就能够带来更大的就业边际效应。

表 5 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民族地区		非民族地区	
	(1)	(2)	(3)	(4)	(5)	(6)
创业者创新能力	2.578*** (0.597)	2.326*** (0.608)	3.667*** (1.043)	3.421*** (1.144)	2.206*** (0.717)	1.889*** (0.719)
企业销售收入	4.775*** (0.333)	4.489*** (0.342)	3.414*** (0.635)	3.125*** (0.685)	5.095*** (0.380)	4.816*** (0.389)
企业银行贷款	0.110*** (0.016)	0.107*** (0.016)	0.139*** (0.036)	0.136*** (0.034)	0.104*** (0.018)	0.101*** (0.018)
企业合作	2.604*** (0.643)	2.355*** (0.655)	1.668 (1.193)	1.478 (1.171)	2.889*** (0.762)	2.624*** (0.785)
创业者性别		2.671*** (0.849)		2.510* (1.408)		2.527** (1.028)
创业者年龄		0.166*** (0.062)		0.068 (0.079)		0.191** (0.076)
婚姻状态		1.309 (1.171)		1.884 (1.623)		0.430 (1.558)
受教育程度		0.465 (0.391)		0.219 (0.687)		0.583 (0.468)
户口性质		0.632 (1.134)		0.955 (1.932)		0.514 (1.354)
创业培训		1.768* (0.991)		3.456* (1.828)		1.415 (1.172)
家庭人口数		0.303 (0.335)		-0.294 (0.519)		0.526 (0.417)
常数项	-17.489*** (2.410)	-29.223*** (4.298)	-17.405*** (3.761)	-22.794*** (5.110)	-17.232*** (2.954)	-30.186*** (5.333)
样本量	2135	2135	513	513	1622	1622
R ²	0.331	0.338	0.321	0.334	0.335	0.342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民族地区企业合作的回归系数是 1.478,但不显著,非民族地区企业合作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显著。一方面,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如信息、交通、物流等方面相对落后,可能导致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进行企业合作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另一方面,在非民族地区,通过企业的同行业合作以及上下游合作等方式形成的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已经显现,而在民族地区,这一产业集聚效应还未显现。因此在民族地区企业合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还不明显。

对控制变量的讨论:第一,返乡创业者中,男性的扩就业效应大于女性,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在非民族地区都是如此。第二,返乡创业者的年龄增加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返乡创业者的见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都会增加,因此其创业企

业的扩就业效应更强。第三,创业者有配偶会促进其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具体原因还需将来深入研究。第四,返乡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越大,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提高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其创业企业就会发展得更好,从而招聘更多的劳动力。第五,非农户口会扩大返乡创业企业招聘规模,可能的原因是,非农户口的返乡创业者比农业户口的返乡创业者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因而其创业企业发展得相对更好,企业才会扩大招聘规模,不过创业者户籍对创业企业招聘规模影响并不显著。第六,返乡创业者参加创业培训会促使其招聘更多的劳动力,可能的原因是返乡创业者通过参加创业培训,提高了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进而带动企业扩大其招聘规模。第七,在民族地区家庭人口数增加会抑制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而在非民族地区会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可能的原因是:一是民族地区生存型创业更多些,同住人口越多,越倾向于采用家庭内部聘用的方式;二是民族地区的血缘、亲缘意识更浓厚,“熟人”社会意识更浓厚,这限制了对非熟人的聘用。

(五)内生性检验

企业招聘员工人数和企业销售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此,本文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进一步在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中,p值小于0.01,故可认为企业销售收入为内生变量。为了解决反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的核心思想是寻找一个外生的、直接影响内生变量(企业销售收入),但不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企业招聘员工人数)的变量。本文以是否对员工进行过技术培训作为企业销售收入的工具变量。是否对员工进行过技术培训将影响到企业销售收入,但对企业招聘员工人数具有很好的外生性,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销售收入对企业招聘员工人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使用是否对员工进行过技术培训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销售收入的影响十分显著,而且回归的F值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进一步说明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销售收入	企业销售收入	企业招聘员工人数	企业招聘员工人数
	2SLS 一阶段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2SLS 二阶段
企业销售收入			9.517*** (1.326)	10.636*** (2.062)
是否对员工进行过技术培训	1.307*** (0.167)	0.933*** (0.181)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011*** (0.119)	-0.806 (0.619)	-17.151*** (3.436)	-11.204* (6.276)
样本量	513	513	513	513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六)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 分类型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返乡创业企业之间的扩就业差异,本文对民族地区的返乡创业企业进行分类,即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

业,然后将变量带入构建的模型(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表7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的招聘人数。表7中(1)列和(3)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7 民族地区分类型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存型创业		发展型创业	
	(1)	(2)	(3)	(4)
创业者创新能力	-0.039 (0.158)	-0.128 (0.169)	4.723*** (1.510)	4.709*** (1.677)
企业销售收入	0.322** (0.146)	0.293* (0.151)	3.687*** (0.780)	3.330*** (0.849)
企业银行贷款	0.111** (0.043)	0.108** (0.045)	0.132*** (0.036)	0.128*** (0.036)
企业合作	0.401** (0.175)	0.402** (0.159)	2.017 (1.744)	2.032 (1.773)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71 (0.684)	-1.138 (1.112)	-21.522*** (5.218)	-28.843*** (7.544)
样本量	155	155	358	358
R ²	0.209	0.253	0.307	0.322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创业者创新能力在生存型创业中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发展型创业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生存型创业,比如夫妻俩开个小卖铺、小饭馆,就是为了生存而言,不需要招聘太多的人手,故创业者创新能力对生存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不明显。发展型创业,创业者返乡创业追求的是当地的商业机会和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要实现上述创业目标,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是关键,因此在发展型创业企业中,创业者创新能力能显著提升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创业企业销售收入在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说明销售收入是企业运行的基础,也是企业保持现有招聘规模和扩大招聘规模的前提。只有销售收入增加,企业才能持续稳定现有招聘规模并进而扩大招聘规模。

企业银行贷款在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显著。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创业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创业者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就越能提升创业企业的运营能力,扩大企业投资规模,从而促进创业企业更好地发展,带动企业招聘更多的员工。

企业合作在两种类型的创业中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生存型创业中显著。生存型创业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合作能够带动创业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成为更高层次的创业企业,进而带动企业扩大招聘规模。

2. 民族地区分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之间的扩就业差异,本文对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按照所从事的行业进行分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然后将变量带入构建的模型(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表8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的招聘人数。表8中(1)、(3)、(5)、(7)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创业者创新能力在各产业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并且在第一产业中显著。第二产业,如制

造业等对创新的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第三产业的创新需要较高的科技水平,民族地区的返乡创业者可能并不具备较强的相应能力,因此创业者创新能力促进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效应不明显。

企业销售收入在各种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并且均显著。这充分说明了企业销售收入对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重要性。

企业银行贷款在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中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其余产业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并且都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民族地区从事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模式比较小,现代化的程度不高,银行贷款很难促进第一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企业合作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端第三产业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中低端第三产业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显著。中低端第三产业技术含量低,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合作容易提升经营规模,进而扩大企业的招聘规模。

表8 民族地区分产业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中低端第三产业		高端第三产业	
	(1)	(2)	(3)	(4)	(5)	(6)	(7)	(8)
创业者创新能力	14.088** (5.335)	13.572** (5.313)	4.553 (2.793)	4.553 (2.771)	1.334 (0.880)	1.033 (0.840)	2.096 (1.414)	1.163 (1.252)
企业销售收入	6.826** (2.683)	6.950* (3.481)	3.848** (1.679)	2.944* (1.672)	2.111*** (0.584)	1.999*** (0.568)	2.655*** (0.588)	2.216*** (0.614)
企业银行贷款	0.154 (0.161)	-0.050 (0.210)	0.122* (0.062)	0.110** (0.053)	0.094*** (0.016)	0.087*** (0.022)	0.256*** (0.017)	0.256*** (0.015)
企业合作	-1.538 (4.909)	-1.508 (4.628)	-1.517 (5.094)	-1.474 (4.822)	2.906*** (0.988)	2.451*** (0.873)	-0.238 (1.208)	-0.703 (1.15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5.368*** (20.133)	-49.363 (34.863)	-11.366 (12.331)	-33.639 (23.175)	-10.428** (4.166)	-16.007** (6.652)	-7.587 (5.750)	-7.412 (6.737)
样本量	50	50	91	91	291	291	81	81
R ²	0.350	0.475	0.226	0.311	0.224	0.255	0.839	0.863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七) 民族地区政府扶持满意度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考察政府扶持满意度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调节效应。政府扶持满意度是指返乡创业者对政府扶持满意程度的评价,等级划分:1=极不满意,2=很不满意,3=不满意,4=一般,5=满意,6=很满意,7=非常满意。借鉴张祥建等的研究方法,^①构建如下模型:

$$Y_i = c + \alpha X_i + \beta K_i + \gamma interact_i + \epsilon_i \quad (2)$$

其中, X_i 、 K_i 的含义见模型(1), $interact_i$ 表示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银行贷款、企业合作与政府扶持满意度的交乘项,其余符号的解释同模型(1)。民族地区政府扶持满意度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9。表9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的招聘人数,调节变量生成前已经过中心化处理,第(1)、(3)、(5)、(7)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

^① 参见张祥建、徐晋、徐龙炳:《高管精英治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调节效应的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归结果。

政府扶持满意度对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银行贷款与企业招聘员工人数的调节作用显著，对企业销售收入、企业合作与企业招聘员工人数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说明民族地区较高的政府扶持满意度会增强返乡创业者创新能力和企业银行贷款的扩就业效应。

表 9 民族地区政府扶持满意度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创业者创新能力	5.931*** (1.268)	4.736*** (1.326)						
企业销售收入			4.357*** (0.625)	3.835*** (0.687)				
企业银行贷款					0.151*** (0.026)	0.139*** (0.025)		
企业合作							4.763*** (1.278)	3.450*** (1.201)
政府扶持满意度× 创业者创新能力	1.685** (0.743)	1.394** (0.671)						
政府扶持满意度× 企业销售收入			0.152 (0.608)	0.040 (0.595)				
政府扶持满意度× 企业银行贷款					0.034*** (0.008)	0.031*** (0.007)		
政府扶持满意度× 企业合作							-0.031 (1.214)	-0.289 (1.167)
政府扶持满意度	0.727 (0.713)	0.065 (0.685)	0.444 (0.798)	0.043 (0.760)	0.602 (0.598)	-0.048 (0.597)	1.050 (0.843)	0.323 (0.774)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572*** (5.199)	-32.331*** (7.268)	-4.376 (3.437)	-15.476** (6.179)	5.577** (2.519)	-11.200** (5.388)	-4.277 (3.971)	-23.447*** (7.066)
样本量	513	513	513	513	513	513	513	513
R ²	0.055	0.120	0.189	0.213	0.180	0.234	0.038	0.106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19 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和影响扩就业效应的主要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明显，但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这一效应相对较弱，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产业进行比较，依然保持这一结论。创业者创新能力、企业销售收入、企业银行贷款都会显著扩大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招聘规模，企业合作不能明显提升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能力。与全国水平相比，民族地区创业者创新能力和企业银行贷款提升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强，企业销售收入相对较弱。

第二，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受到创业类型和所属产业的影响。从创业类型

看,生存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低于发展型创业,创业者创新能力对发展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更明显,企业合作对生存型创业的扩就业效应更明显。从所属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其扩就业效应高于第三产业;创业者创新能力对第一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更明显,企业银行贷款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更明显,企业合作对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更明显。

第三,对政府扶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能力。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者对政府扶持的满意度越高,创业者创新能力和企业银行贷款提升创业企业扩就业的效应就越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民族地区要继续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活动,推动返乡创业企业发挥更大的扩就业效应,进而实现民族地区更加充分的就业。可以通过完善返乡创业的支持政策体系,优化返乡创业的营商环境,深化创业企业的进入规制改革,^①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返乡创办高质量的创业企业,实现扩就业。要注意民族地区不同产业间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能力上的差异。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扩就业效应要高于第三产业,因此政府的扶持政策应该有侧重地向扩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的产业倾斜,使得政策效应最大化。建议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更多金融支持、政策扶持等方式促进返乡创业企业从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过渡,促进返乡创业企业从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而提升创业企业的扩就业能力。

第二,民族地区需要广泛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充分发挥“能人”型返乡创业者的创新能力,推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建议加强创业创新园区、科技园区等平台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奖补、创新补贴等政策,让民族地区的乡村有机会吸引更多“能人”返乡创业。加强人才服务站、专家服务基地等人才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生活保障措施,让乡村的环境能留住“能人”。此外,可以通过网络销售、政府采购等方式,拓宽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销售渠道,帮助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提高销售收入。进一步加大对当地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力度,积极提高当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劳动力。

第三,银行贷款的配置应该继续向民族地区倾斜,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议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特别是信贷投放要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完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第三方担保机制和土地使用权抵押机制,推动更多的金融资金投放给返乡创业企业,县域吸收的存款优先满足返乡创业融资需求。在信息、交通、寄递、物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开展企业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责任编辑 马 骅〕

^① 参见周清杰、张志芳:《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